

· 人文城市研究跨学科学术共同体 · 文明互鉴与城市中国（五） ·

# 从“四景切换”到诗学重构

——论城市叙事研究的文学地理学路径

葛永海<sup>1</sup> 潘巨强<sup>2</sup>

**【内容摘要】** 城市叙事具有地理空间描述与文学想象的双重属性，而文学地理学作为融合文学与地理学视角的交叉学科，可将其理论观点系统融入城市叙事研究的阐释框架和学术路径，探讨地方传统、历史想象与空间记忆对城市叙事创作与接受的深层影响，并且在中国城市叙事的古典传统与现代变革之间构建起一脉贯通的研究参照系。借鉴影像学中的观察逻辑，城市叙事研究可构建起“远景—中景—近景—特写”四级视角，“远景”致力于宏观文学地图的绘制与文学生态分野的辨析；“中景”聚焦城际互动的“双城”现象，揭示其文化对话机制；“近景”深入单一城市内部，追溯其从城市志、城市笔记到城市小说的文体演进与空间意义的积淀过程；“特写”则剖析具体空间场景的符号化意义与空间生产的无限可能性。研究的关键在于持续不断地勘探、激活并重构城市独特的叙事研究范式与精神图式，推动城市叙事研究走向更为广阔的历史、文化与思想语境，为构建本土化的空间诗学提供理论路径。

**【关键词】** 城市叙事研究 “四景切换” 文学地理学路径 空间诗学

**【作者】** 1 葛永海，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2 潘巨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浙江金华 32100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游士叙事视角下的明清小说地图研究”（19AZW014）

“城市叙事”指的是围绕城市展开的各种文学叙事，与“城市文学”的概念相比，它更具包容性。<sup>①</sup>中国的城市叙事由来已久，其作为空间背景、结构要素与文化想象长期存在于中国文学中，向上可追溯至《诗经·大雅》的《灵台》与《楚辞·九章》的《哀郢》，中经两汉的都城赋与魏晋六朝的都城笔记，在宋元时进入话本与风俗志的民间视野，至明清，小说缘城而起，因市而兴，对城市民众的思想情感及娱乐审美的全方位表达使其成为城市叙事最具代表性的文体。概而



言之，中国古典城市叙事的演变格局，即宋前是雍容典雅的“都城圣咏”，宋元是俚俗活泼的“市井俗调”，明清则是世情百态的“城镇和声”。而若以现代城市叙事所关注的工业文明表征的城市图景为考察尺度，在晚清《海上花列传》《海上繁华梦》等一批“海上”系列小说中，都市空间的繁华景象及其构筑的压抑疏离感，被资本竞争与消费主义激发的焦虑心理<sup>②</sup>等，不断在叙事中被强化。20世纪20年代后，“新感觉派”小说家崛起文坛，以上海都市景观为书写对象，既呈现其驳杂陆离的视觉表象与急促紧张的生活节奏，亦深入描摹都市人的内在欲望波动，其都市书写已带有明显的现代性特征。有学者指出，城市叙事研究以现代性为主导性标准，在塑造特定问题意识的同时，也无形中构成了学科内部的认知壁垒。<sup>③</sup>其结果就是，随着“现代性”定义的西方化，学界开始出现“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中国文学即使是城市人写的，写的也是城市里的事情，但不能算城市文学”<sup>④</sup>的声音，“现代性”成为一种垄断性标准，湮没了中国城市发展的差异性和特殊性。作为一种文化表征，现代性分析固然重要，却难以全面覆盖中国城市叙事所承载的多元文化属性与价值取向。中国城市叙事研究显然不能隔断城市与历史传统之间的关联，这一传统不仅关涉现当代城市小说业已形成的研究范式，更指向汉代都城赋、六朝都城笔记、唐传奇、宋话本和明清小说中的城市叙事等前现代的文学传统。

那么，如何立足中国城市叙事的实际展开研究？文学地理学原理中由版图复原、场景还原、精神探原三大研究路径所构成的“三原论”<sup>⑤</sup>为中国城市叙事研究提供了一条系统而深入的学术理路。本文拟借鉴影像学语言中由远及近、由宏入微的观察逻辑，通过四种不同层级的视角分析，提出中国城市叙事研究的“四景切换”论，推动其全面融入本土化的历史与文化语境。所谓“四景”，即城市叙事研究视角的“远景”“中景”“近景”与“特写”：“远景”是为全域概览式的研究视角，旨在构建由城市叙事的多元发展而形成的文学地图，呈现一段时期内中国文学版图上由城市叙事的分化而形成的文学生态分野；“中景”是为城际互通式的研究视角，旨在发现城市发展史上那些或彼此互补、或鲜明对立、或遥相呼应的“双城”现象，揭示双城叙事的文化互动机制；“近景”是为城市写照式的研究视角，剖析城市叙事自城市志、城市笔记到城市小说的叙事演变，阐释其经由空间意义叠加而形成的独特文化形态；“特写”是为场景细描式的研究视角，旨在挖掘城市叙事中的典型空间场景及其象征意义。就学术命意而言，这四种视角的切换旨在形成一条从现象到本质、从空间描摹到精神揭示的逻辑链条，推动城市叙事研究向更具学理性的空间诗学升华。

## 远景—全域概览：城市叙事版图与文学生态研究

城市叙事的“远景”研究，要求将视野从单一的文本或作家抽离，提升至一个宏观的、全域性的高度，如同站在高空俯瞰大地，观察山川河流的走向与城镇聚落的分布。这种范式旨在绘制一幅动态的“文学地图”，<sup>⑥</sup>将散落在浩瀚历史与广袤疆域中的城市叙事作品进行空间化的组织与呈现，从而揭示出中国城市文学版图上因地域差异、文化分野和时代变迁而形成的独特文学生态。通过构建“文学地图”，可以考察中国城市叙事在不同历史时期汇聚于哪些文化区域，区域之间如何互动，以及文学资源的流向与“势能”如何塑造了整个时代的文学风貌。

全球视野是对城市叙事的版图研究所能持有的最远视距。它要求将全球范围内的主要城市与城市群视为一个彼此关联、相互参照的宏大网络。晚清小说在对这一网络的文学呈现中，初步显露出一种全景式的“世界城市”观念。小说中频繁出现的环球旅行者、外交官与商人，他们的足



迹与视野串联起从伦敦、巴黎、柏林到北京、上海、广州的地理空间，其叙事本身便构成了一幅动态的全球文学地图。这并非简单的二元中西对比，而是试图在文学中勾勒并理解由不同文明板块、发展梯次与文化特质的城市群所构成的世界格局。

这一全球城市图景的建构，常通过小说人物的游历与评述来实现。如在晚清科幻小说《月球殖民地小说》中，主人公乘坐热气球周游世界各大城市，包括中国北京、广州与美国纽约、英国伦敦、日本东京、印度孟买等，其间所见中国与西方（或西化国家）的城市景观，在现代性与文明程度上体现出鲜明差距——纽约的都市景观“好比是画图一幅，中间四五十处楼房，红红绿绿的，好比那地上的蚁穴、树上的蜂巢；那纵横的铁路，好比那手掌上的螺纹”；<sup>⑦</sup>而遍览北京，虽然城中也是“管弦丝竹，热闹异常”，但城市照明依然依靠烛火纱灯，人烟辐辏之地，或为唱京戏的“四喜名班”，或为斩首志士的“刑部衙门”，整座古城依然昏沉在愚昧、落后而封闭的现代前夜。又如《淞隐漫录》的《海底奇境》<sup>⑧</sup>一篇中，聂祥生携多国译员在欧洲十数国间“游历几周”，其行程本身便是一次对欧洲城市群的文学勘探。他对瑞士山水“尤所心赏”，又与瑞国女子兰娜交往，获赠法宫珍宝，此等情节不仅呈现了异域风情，更通过人物的流动与见闻，将巴黎的宫廷繁丽与瑞士的湖光山色置于同一叙事视野中进行品味与比较，体现出西方城市群的内部差异。作者王韬曾周游欧洲列国，在《漫游随录》中，他用“别一宇宙”“别一洞天”等词来形容这些西方现代城市对其造成的强烈震撼：“既抵法埠马赛里，眼界顿开，几若别一宇宙。若里昂、若巴黎，名胜之区，几不胜数。逮至伦敦，又似别一洞天。其为繁华之渊藪，游观之坛场，则未有若玻璃巨室者也。”<sup>⑨</sup>这类宏观的评论直接出自小说作者之口，形成一种总括性的“世界城市论”。陆士谔在《商界现形记》中也借叙事者之口夸耀：“繁华等于巴黎，蕃盛驾于伦敦……吾谓英之伦敦未及吾海上之富有也，法之巴黎无过吾海上之奢丽也。”<sup>⑩</sup>此种将上海与伦敦、巴黎直接并列比较的豪语，其背后即一种将中国新兴通商口岸置于世界著名都市序列进行评判的全球城市观。

若将视野向内收聚，在游历经验遍及天南地北的小说家创作中，全国范围内不同地域的多个城市所呈现的多元文化面貌与叙事倾向也足以建构起文学版图的复杂生态。以吴趼人所著谴责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为例，其叙事空间几乎覆盖晚清所有重要城市，尤以广州、上海与北京为叙事轴心，分别承载了不同的文化意涵与叙事功能。广州作为小说中风俗考察与社会文化缩影的空间载体，其描写深具地域特质。如第二十三回所记香云纱，乃广东特有织物，第三十三回述及专为外人提供情色服务的“咸水妹”，第五十九回详载粤地银圆流通之俗，即所谓“烂板”与“光板”之别，以及“贴水”之习，此类细节非熟谙粤地民情者不能道。上海则作为新兴都市与“怪现状”的高发地带，呈现出先锋性与传统性兼有的复杂特征。小说既记载了大量以上海官民为主体的丑闻轶事，亦凸显该城作为时代前沿所特有的新鲜元素。新旧杂糅、华洋并存的新闻事件共同形塑了上海独特的城市气质。吴趼人借文中人物文述农之口点明：“上海地方，无奇不有，倘能在那里多盘桓些日子，新闻还多着呢。”<sup>⑪</sup>小说由此展开讲述了“总巡行私政”“东洋照会”“巡捕泄私恨”等故事，不仅勾勒出上海作为信息集散地的媒介属性，亦暗示其作为现代性经验温床的叙事潜力。北京在小说中则成为落魄贵族与帝国余晖的象征空间。吴趼人一方面刻画旗人权贵养尊处优之态，如神机营兵丁出行必有仆人携鸦片烟枪随行，手执鹤鹑囊或臂架猎鹰，尽显特权阶层的奢靡做派；另一方面，更以细腻笔触揭示皇权衰微背景下旗人群体的困窘现实——如借蘸唾沫写字以偷食桌上芝麻的细节，在滑稽表象下暗含阶层没落的悲凉。这些没落旗人的怪诞行径成为晚清政治困局与文化危机的隐喻，折射出帝国体制整体性溃败的时代症候。

吴福辉在为《京派小说选》编写前言时，对多元化、非均质化的地域文学生态寄予厚望：“每一个文化地域绝非注定便能产生一种文化或文学的流派的。如果历史让它产生了，这个流派虽然很难囊括这块土地上一切纷繁的文学现象，却实实在在可以成为一部分文化的代表。”<sup>⑫</sup>而若将城市叙事所映照的不同城市板块以话语共存的形式整合起来，“不同作品中诸多单一的城市‘小地图’可以整合成超越地方、横跨时空的精神‘大地图’，从而为总体性的中华文化大场域增色添彩”。<sup>⑬</sup>通过这种“远景”式的叙事现象揽观，可以发现，中国任何时期的城市叙事皆非一个均质化的整体，而是一个由多个各具特色的“文学生态区”构成的复杂版图。每个生态区都有其核心城市、主导性叙事主题、标志性空间意象和独特审美品位。这些生态区之间，既有分野与隔阂，更有交流与融合。文士的宦游、商人的逐利、书籍的刊印与传播，如同无形的水流，在这片文学地图上输送着思想、文体与故事，从而引发了文学生态的演替与变迁。此外，这一研究路径还可有效分析20世纪以来中国城市格局巨变对文学版图的重塑，探究经济转型、人口迁徙、媒介变革等因素如何影响当代城市叙事的主题偏好、风格流派以及传播接受的地域性特征。

在近代以来的城市化进程中，中国南北的许多重要城市各自经历了崛起与转型、复兴与萧条等不同发展阶段，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城市风貌和文化心理。忽略不同城市之间差异巨大的发展格局，抽象地谈论现代性、都市病等城市叙事的总体特征，只能是浮于表面的以偏概全。有学者指出，“新时代文学”的文学史分期已经逐渐从城市经验的生活话语中逐渐生长并强盛起来，其最主要的发展目标之一，即是从“走向世界”回到“中国故事”，重建中国文学的主体性。<sup>⑭</sup>随着北京、上海、南京、苏州、杭州、广州、深圳、台北等地作家自觉开展城市叙事的文化寻根，为城市文学梳理历史传统与文化谱系，城市叙事中自给自足的话语腔调、地方知识与时空记忆逐渐融汇成一个个意义集合，并经由文学转译为《烟火漫卷》中的哈尔滨、《繁花》中的上海、《烟火》中的天津、《夜泊秦淮》中的南京、《咸水歌》中的广州，等等。一种新的城市文学生态谱系逐渐成形。

因此，构建城市叙事的文学地图，并对其背后的文学生态进行研究，是理解中国城市叙事历史脉络与宏观态势的第一步。它要求研究者具备一种“跨地域”的整体视野，将城市置于广阔的地理与文化网络中进行定位，而不是将其视为心灵与意义的孤岛。只有在宏观“远景”之下，才能准确地把握每座城市及其关联的每部重要作品在中国文学整体格局中的位置与意义，也才能为后续的“中景”“近景”与“特写”研究提供一个坚实的空间坐标系。

## 中景－城际互动：双城叙事的诠释活力与研究图景

在“远景”所构建的宏观文学地图的基础上，“中景”研究将焦距拉近，从全域概览转向城际互通的比较分析，深入探究城与城之间的动态对话关系。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众多城市并非孤立发展的“点”，而是常常两两配对，形成或紧密关联、或鲜明对立、或遥相呼应的“双城”关系。这种“双城”现象打破了线性史观，将城市空间转化为叙事动能，如同一组组镜像或对话，通过比较分析其在主题、意象、风格上的异同，可以有效揭示其背后折射的时代变革、文化碰撞与价值冲突。<sup>⑮</sup>因此，“双城叙事”可以成为极富活力的研究范式，通过考察两个城市的相互参照与张力关系，可以揭示单一城市研究难以抵达的深层文化蕴涵。

最典型的“双城叙事”莫过于都城更迭所引发的文化想象变迁，<sup>⑯</sup>如唐代的长安和洛阳、两宋的汴州和杭州、明代的北京和南京等。两宋之际最具代表性的“双城叙事”表现为汴京与临安



在文学映像中的承转离合。这一叙事转向不仅标志着地理中心的位移，更折射出中国近世城市空间的重要变革。宋代城市格局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商业化、平民化转型，这一转变在话本小说中被凝练为北宋东京的“梦华追忆”和南宋临安的“世俗风情”两种叙事范式，共同勾勒出中国城市文学从士人浪漫想象向市井日常书写的重大转变。汴京作为北宋都城，其形象在南渡后的文学叙事中被赋予浓郁的怀旧色彩，如《宣和遗事》记载“樊楼乃丰乐楼之异名，上有御座，徽宗时与师师宴饮于此，<sup>①</sup>使这座酒楼承载了超越建筑本身的历史意蕴。此外，在《东京梦华录》《梦粱录》等城市笔记与《宣和遗事》等话本小说中，开封城的节庆活动与四时游乐总是被描绘得人声喧阗、鱼龙漫衍，而尤以上元的五夜灯市最为繁盛，如《戒指儿记》所述：“不觉时值正和二年上元令节，国家有旨，赏庆元宵。鳌山架起，满地华灯。笙箫社火，锣鼓喧天。禁门不闭，内外往来。”<sup>②</sup>开封城灯火辉煌的不眠夜连接着一个时代的盛世梦想，而遗民的都城“梦华录”则凝结为一种在后世时时被唤醒的时空记忆体与城市精神图式。

随着政治中心南迁，临安在承袭汴京风习的同时，也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城市叙事。《武林旧事》记载，“杭人亦无时而不游，而春游特盛焉……日糜金钱，靡有纪极。故杭谚有‘销金锅儿’之号”，<sup>③</sup>此语道出了临安消费文化的兴盛。临安的商品经济呈现出比汴京更加成熟的流通型特征，丝织业尤为发达。《新桥市韩五卖春情》中吴家丝绵铺“收下的丝绵，发到铺中，卖与在城机户”的经营模式，以及《错认尸》等多篇话本对机户活动的记载，印证了江南地区加速的城市化与商业化进程。据《西湖老人繁胜录》记载，临安有“四百十四行”之多，形成了川广生药市、金银市、珍珠市等专业市场，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商业活力。与此同时，话本小说的叙事方式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以《西湖三塔记》为例，小说叙主人公奚宣赞清明踏春的游迹，其地理方位刻画尤为细致：“奚宣赞得了妈妈言语，独自一个拿了弩儿，离家一直出钱塘门，过昭庆寺，往水磨头来。行过断桥四圣观前。”<sup>④</sup>说话人努力以城市实有地标建筑与空间格局唤起听众亲切的现场感，使穿行于街头巷尾的市井细民成为话本的主角。而这种叙事重心的下沉，标志着受众从文人精英逐渐向市井平民的过渡，反映了一种由城市转型所推动的文化权力在社会阶层中的微妙转移。

如果说开封与临安的对照呈现了古典时期政治中心转移带来的文化变迁，那么，扬州与上海的“双城记”则生动地演绎了中国从前现代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阵痛与梦想。在清代中期以前，扬州是繁华的代名词，是“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人生理想的终极归宿。作为盐商聚集地和南北漕运的枢纽，扬州文化以享乐、精致、奢靡为特征，尤其“和风月紧紧捆扎在一起”。<sup>⑤</sup>明清小说中的扬州就是一个由园林、瘦马、画舫、戏曲构成的风月空间，如《初刻拍案惊奇》卷十二《陶家翁大雨留宾 蒋震卿片言得妇》中所言：“从来仕宦官员，王孙公子，要讨美妾的，都到广陵郡来，拣择聘娶。所以填街塞巷，都是些媒婆撞来撞去。”<sup>⑥</sup>前现代的扬州叙事代表了传统农业帝国的商业文化所能达到的极致繁华。然而，随着晚清国门被打开，上海作为新兴的通商口岸迅速崛起，取代扬州成为新的“东方魔都”。晚清的谴责小说和狭邪小说中，叙事舞台悄然从扬州转移到了上海。与扬州的传统与封闭不同，上海的繁华是现代的、开放的、生产与消费并存的。在《海上花列传》《海上繁华梦》《海上尘天影》等“海上”小说的叙事场景中，充满了洋行、工厂、石库门、跑马厅、电灯、自来水等现代性景观，叙事主题也从文人雅士的风流韵事，转向买办商人的投机冒险，知识分子的启蒙求索以及底层民众的生存挣扎。上海的叙事充满了矛盾与张力：它是文明的窗口，也是罪恶的渊薮；是希望的灯塔，也是绝望的深渊。从“扬州梦”到“海上繁华梦”的变迁，不仅是城市地位的兴替，更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宗法社会转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缩影。

扬州代表了旧式都市繁华的终结，而上海则预示了新式现代性的开端，二者共同构成了一部关于中国城市命运转折的时代寓言。<sup>②</sup>

将“双城叙事”作为一种城市叙事的研究范式加以运用，其真正价值不在于确立某种稳固的对照体系，而在于揭示一种流动的、充满生产性的辩证关系。对于现当代城市叙事而言，“双城”模式更是分析城市关系网络及其文学表征的利器。比如广州与深圳就是一对为当代学者所津津乐道的“双城”，这两座常被置于“传统”与“现代”、“积淀”与“创新”二元框架下的城市，其文学实践的复杂性恰恰在于它们不断溢出并重构这些预设的边界。广州的城市写作如欧阳山《三家巷》、阿菩《十三行》、林棹《潮汐图》等，总是离不开对筚路蓝缕的开拓精神、云蒸霞蔚之岭南风雅及“十三行”时期社会面貌的追溯，但这并非一种对岭南古风的单纯怀旧，其“尚古”本身即一种面对剧烈现代性变迁的回应策略，是一种在断裂中寻求连续性的文化实践。《潮汐图》对前现代广州以及十三行中西交流景象那铺排恣肆的描绘，仿佛预示了“千年商都”在改革开放后将会绽放的那一番环境包容、商业繁荣、文化多元的社会景象：“有十三商行夷馆，收留寰球番鬼和番鬼公司。有海皮四街：联兴、同文、靖远、猪巷。猪巷正名新豆栏，人家叫来叫去叫成猪巷应该有个道理……有花旗鬼沿江岸踩独轮车。有装载褪骨鸡、蟹肉汤的大餐盘向廊上飞驰。有唱诗班、白兰地、八枝吊灯。有让人大开眼界寰宇的一切……”<sup>③</sup>而深圳的城市文学如南翔《伯爵猫》、邓一光《深圳蓝》、谢宏《纹身师》、吴君《同乐街》等，也远不止“移民进城故事”的集合，它聚焦现代都市生活、移民文化、科技发展、青春活力等主题，通过城市叙事开展一场关于“未来”如何被想象、被建构的美学实验。二者的关系，并非静态的对照并置，而是构成了一种持续的、双向的“翻译”过程：广州将其历史深度转译为当代语境中的可读文本，深圳则将城市化、全球化的流动经验转译为地方性的叙事。在此意义上，两座城市的作家群体，实则共享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写作场域”，他们的互动更像是一种在不同端口对同一核心命题——“岭南记忆”与“湾区认同”<sup>④</sup>——进行的并行处理与相互参照。

综上所述，“中景”式的双城叙事研究，通过引入一个参照系，极大激活了城市叙事的诠释潜力。它将城市从一个孤立的文本，转变为一个关系网络中的节点，推动学者去思考城市之间的“互文性”。无论是都城更迭、经济中心转移，还是文化风格对峙，双城叙事都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更为宏大和复杂的历史图景。

### 近景—城市写照：从城市志、城市笔记到城市小说的文体衍化

当研究的镜头从“中景”的城际互动进一步推进，便进入了“近景”的城市写照。此维度以文学地理学中的“场景还原”为理论参照，深入单一城市的形态、历史和文化内部，进行“地方性知识”的深度考古——通过追溯其叙事传统从城市志（描绘城市空间框架与建制）、文人城市笔记（捕捉人文风俗与城市传奇）到近现代和当代城市小说的文体衍化，剖析一座城市独特的文化品格如何在物质、人文、记忆三重空间的叠加互动中被历史性地书写。这种研究不再满足于宏观的比较或外部的关联，而是致力于揭示一座城市“自我言说”的内在逻辑。

在前现代中国，最早也最系统地书写城市的文本，当属地方志中的“城市志”。与一般方志出自先秦诸侯国史、在《越绝书》《华阳国志》后形成范式<sup>⑤</sup>的历史渊源不同，城市志的祖脉或可追溯至《周礼》，其《考工记》记载的“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径、九纬，经涂九轨。



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市、朝一夫”<sup>②7</sup>等内容，产生了我国最早的城市规划理论。不过，专门以特定城市为书写对象的城市志却出现得较晚，一般学者认为成书于东汉，魏、晋、隋、唐间又有增补的《三辅黄图》也许是中国城市志最早的开端。<sup>②8</sup>在《三辅黄图》的影响下，后世产生了许多有关长安的城市志，其书写内容逐渐从城市建制、布局、功能等城市学话题扩散到都城遗事、市民生活、市井传说等故事层面，其较著者如唐张澍《三辅故事》，北宋宋敏求《长安志》、吕大防《长安图记》，南宋程大昌《雍录》，元李好文《长安志图》、骆天骧《类编长安志》等。长安志以外，北宋周应合《建康志》，南宋乾道、淳祐、咸淳年间《临安志》，元代《金陵志》也产生了较大影响。早期依据城市志进行写作且产生重要影响的文学作品当属左思的《蜀都赋》。左思有感于此前京都赋作品的“侈言无验，虽丽非经”，在总序中表达了“贵依其本”“宜本其实”的写作主张，正是在这一创作理念的指导下，《蜀都赋》的创作与方志产生了深刻的内容联系：“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sup>②9</sup>为此，左思遍览方志群书、多方求证，做到有本可依、有实可考，赋中对于蜀都宫殿的描写几乎成为研究三国时期蜀地建筑的唯一史料。有学者就指出：“刘备、刘禅在成都，怎样建成一个国都的规模，史书已经完全失载了，仅仅依靠左思这篇赋才可以知道一点大概。”<sup>③0</sup>

作为一种官方修撰的文献，城市志的叙事具有客观化、知识化和空间化的特点，它以一种百科全书式的笔法，分门别类地记录一座城市的建置沿革、城池宫室、山川地理、风俗物产、人物传记等。其空间呈现方式是地图式、区划式的，旨在提供一种全景的、可供查阅的“空间信息”。在城市志中，空间是稳固的、分类的、非人格化的。尽管其中也包含人物与事件，但它们往往是作为空间的附着物而存在，服务于对该地域“地灵人杰”的印证，缺乏连贯情节与主观情感。总体而言，城市志提供了关于一座城市最基础的“物质空间”框架，但它本身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叙事。

与官方恢宏的城市志并行发展的，是文人私撰的、带有强烈审美倾向的“城市笔记”。这类文本，如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北魏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唐代孙棨的《北里志》，宋代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吴自牧《梦粱录》、周密《武林旧事》等，代表了城市叙事的“人文空间”的系统呈现。与城市志的宏大、客观不同，城市笔记的视角是私人的、感性的、片段式的，作者往往以“亲历者”或“追忆者”的身份，记录城市的四时风物、市民生活与风俗逸闻。其叙事结构是散点透视的，由一个个独立的“场景”或“条目”拼接而成，如“御街”“瓦舍”“酒楼”“夜市”等。空间在这里不再是抽象的地理区划，而是充满了人的活动、声音、气味和情感的“场所”。就城市笔记的发展规律而言，其故事性与情感浓度随着时代更迭而不断强化。宋元时期是城市笔记在叙事演进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时代转折点，其对城市节庆、时令、轶事的书写往往与城市历史、市井格局与城市生活的细节高度结合。如《武林旧事》卷三《祭扫》叙杭城居民清明踏春的盛况：“清明前三日为寒食节，都城人家，皆插柳满檐，虽小坊幽曲，亦青青可爱，大家则加枣饧于柳上，然多取之湖堤……南北两山之间，车马纷然，而野祭者尤多，如大昭庆九曲等处，妇人泪妆素衣，提携儿女，酒壶肴爨。村店山家，分俊游息。至暮则花柳土宜，随车而归。”<sup>③1</sup>这段记载中提供的节庆时令、地域空间与人物行程信息为读者视角的代入设置了一个有效的切入点，读者可以随作者脚步“漫游”于城市街巷之间，体验其独特的城市节奏与生活质感。城市笔记极大地丰富了城市的“人文肌理”，使城市从一个静态的地理名词，变成了一个动态的、充满人间烟火的综合生命体。然而，城市笔记的叙事仍然是碎片化的，它捕捉“瞬间”与“场景”，却缺乏一个贯穿始终的人物命运与情节线索，城市生活被呈现为一幅幅生动的“风俗画”，但尚

未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

城市笔记在积累城市人文细节的同时，也为更具结构性、复杂性的城市叙事奠定了基础。宋元时期，随着市民文化勃兴与“说话”艺术的盛行，以城市为叙事中心的话本小说开始萌芽。以《西湖三塔记》《金明池吴清逢爱爱》《闹樊楼多情周胜仙》等为代表的宋元话本小说，已初步展现出依托特定城市空间格局与文化记忆来推动情节发展的特征，形成了早期城市小说的叙事传统。不过，这一时期的城市小说主要围绕都城展开，数量有限，且题材多集中于爱情和志怪，对世情百态的描摹尚欠深度与细腻，城市作为叙事动力的潜能还未充分释放。明清时期，城市小说在宋元传统的基础上实现了长足发展与全面成熟。这首先表现为作品数量的激增与叙事地理的拓展。例如，《西湖二集》《西湖佳话》等专述杭城的作品，其故事容量与城市细节的密度已远超宋元同类题材。更重要的是，小说叙事的目光投向了更多具有文化个性的城市：如《南朝金粉录》写南京、《风月梦》写扬州、《儿女英雄传》写北京、《蜃楼志》写广州、《海上繁华梦》《海上花列传》写上海，等等。明清城市小说不仅继承了城市志的“空间框架”与城市笔记的“人文细节”，更通过连贯的人物命运与复杂的情节网络，将物质、人文与记忆三重空间有机融合。城市在小说中不再仅是故事发生的背景，而逐渐演进为具有内在品格、能够影响甚至决定人物命运的核心“文化角色”。其对城市生活的深度书写、市井人物的鲜活刻画、城市文化的多元呈现，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直接开启了近代城市叙事的先声。

而当文学的目光投向近现代的上海滩，城市叙事便从传统的自我写照，跃进至一个前所未有的沸腾场域。它不仅是故事发生的背景，更成为塑造人物、结构情节的核心叙事动力与终极叙事目的。<sup>②</sup>围绕上海展开的叙事文本，往往呈现出一种集炽烈的世俗性与深刻的反思性于一体的叙事形态，绘就了一幅繁华与腐朽共生、进步与落后并存、现代性体验与人性异化交织的浓烈画卷。上海的“物质空间”被资本与工业逻辑重塑，高耸的建筑群、纵横的街市、密织的里弄，构成一套全新的、充满诱惑与压迫的视觉符号系统。空间高度功能化与商品化：交易所是财富幻灭与重生的楼宇，跑马厅是激情冒险的宣泄场，酒楼堂子则是欲望杂陈、情色交易的集市。在《海上繁华梦》中，招牌上“必得财”“万倍利”<sup>③</sup>的字样，宣告了这座城市以“利”为生存竞争的基本逻辑，空间本身跃升为具有侵略性的叙事角色。在此基础之上，其“人文空间”呈现出极度复杂与异化的面貌。传统人际关系在资本与移民冲击下瓦解，一种冰冷的“实利意识”弥漫其间。《海上花列传》中吴松桥对乡下父亲的冷酷，揭示了亲情伦理在实利法则下的脆弱与无以为继。海派小说家如张资平、叶灵凤、章克标等人的性爱叙事则将欲望本身塑造为驱动人物的核心生存哲学，并借此对性爱之欲与城市欲望作出互文式的隐喻表达。在这样的城市体验中，人的属性被物的属性所遮蔽，个体在享受空前自由的同时，也承受着原子化的孤独与煎熬，《上帝的儿女们》中恩金“觉着一切的幻灭。她想世界快要崩毁了吧”，<sup>④</sup>正是对这样一种都市生存状态的写实独白。尤为深刻的是，上海的“记忆空间”是一种在断裂中被迫生成的、混合着创伤与骄傲的“现代性想象”。它既是承载民族屈辱的“十里洋场”，又是紧追世界潮流的现代化先锋。这种撕裂赋予了上海城市品格内在的紧张与批判性：繁华既是进步的标志，也是罪恶的渊藪；摩登既是解放的力量，也是异化的源头。新感觉派以眩晕的语言捕捉碎片化的都市瞬间，正是对传统线性历史记忆的叛离；而张爱玲则在其笔下将现代性的震颤与旧家族遗韵、市民世相糅合，在参差对照中演绎苍凉的人性，深化了这座城市的心理层次。因此，上海的城市叙事，是对其外部形态的巨细写生，更是对其内在精神的深度解剖。它迫使文学不断更新语言与形式，以抵近其精神品格几乎无可穷尽



的复杂性。在此意义上，上海不仅是现当代中国城市叙事的真正起源与高潮，更提供了一个永恒的现代性隐喻：人在自己创造的辉煌而骇人的都市奇观中，为何不断迷失，又应如何找寻自我？

至于当代，“文化寻根”已然在文学创作层面成为当代城市书写的核心范式。<sup>⑤</sup>20世纪80年代，邓友梅《双猫图》《烟壶》与苏叔阳《傻二舅》等京味小说通过铺展市井风俗画卷呈现北京的传统伦理秩序；冯骥才以《神鞭》等“津味”小说钩沉天津的“奇人”故事以及围绕他们而形成的民间“神话”；陆文夫则借《美食家》将苏州娴静高雅的文化气质内化为一种显著的文学风格。此类创作不仅表达了对城市文化的自觉守护，更体现了地域传统对作家审美格局的塑造。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寻根向现代都市延伸。王安忆的《长恨歌》《考工记》将宏观文化寻根转化为对上海家族史与物质文明的微观考证，在个人营造史与城市建筑史的交织中建构海派文明的谱系。岭南作家则通过历史叙事强化和重构南方城市的文化身份——林棹《潮汐图》追溯近代珠江流域在中西方文明碰撞下产生的魔幻社会图景，葛亮《燕食记》则借饮食史追忆广府与香港之间剪不断的文化亲缘。这些创作通过对地方性知识的挖掘，在全球化语境中确立了城市主体的历史坐标。21世纪以来，城市传记写作的兴起进一步深化了城市叙事对文化根系的勘探。邱华栋的《北京传》体现了“城市生命体”的创作理念，<sup>⑥</sup>标志着作家的城市认知从早期强调感官疏离的现代性印象，转向对城市历史脉络的深层把握。此类写作通过追溯城市文明史，消解了人与城之间的紧张隔阂，形成更具历史纵深的对话关系。叶兆言《南京传》、叶辛《上海传》等作品构成的城市传记系列，既受西方《伦敦传》等著作启发，亦是对马克斯·韦伯“中国无城市”论的有力回应——这些文本通过挖掘每座城市独特的文明轨迹，阐述了中国不同城市、不同历史阶段的独特性，有力反驳了将中国复杂多元的城市历史抽象化为单一属性的西方认知惯性。

从城市志的“空间构型”，到城市笔记的“场景拼盘”，再到城市小说与城市传记的“人格塑造”，这一演进过程清晰地展示了中国城市叙事如何一步步深化对“地方”的理解与表达，也在精神层面响应了原型空间即“家园感”（sense of home）的召唤。“城市或土地被视作母亲，它有抚育机能”，<sup>⑦</sup>这种与“家园”的精神同构关系赋予城市一种强大的融合力量，能够把人的思想、回忆和梦想融合在一起。不过，虽然“家”这个词在人从野蛮进入开化时代时就获得了重要意义，可它又将在城市文明的现代性洗礼下逐渐失去这些意义——这是一种建立在文化自省理念上的观点，它从根本上指出，寻找家园是现代人的基本处境，随着岁月推移，人类返回精神故乡的渴望变得愈为迫切，其目标也愈加难以实现。一座城市的独特性，并非仅在于物质景观，更在于人文生态与历史记忆，而“近景”式的研究范式，正是要求研究者像一位耐心的传记作家一样去梳理和解读一座城市“自我叙述”的漫长历史，从而真正把握其不可复制的内在灵魂。

### 特写－场景细描：城市空间的象征性与符号化

当研究视角从“近景”的城市整体写生，最终推向“特写”的场景细描时，便进入了城市叙事研究最微观也最深刻的层面。这一范式将分析焦点对准城市中的具体空间单元——可能是一方园林、一座桥、一扇城门，也可能是一个茶馆、一座车站，甚至是一栋楼宇、一间卧室。它不再满足于描绘或记录，而是尝试运用理论工具，聚焦城市叙事中最具体的空间单元，解码其作为文化符号的深层意义，以“精神探源”的方式探讨这些意义在历史流变中被建构、凝固或解构、重塑的过程。通过这种“特写”分析可以发现，城市叙事的无限性，恰恰蕴藏于其空间符号的丰富性、多义性与动

态演变之中。在中国的城市叙事中，这些空间符号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意义相对稳定、具有高度文化浓缩性的“凝定空间”；另一类则是随着城市时间加速意义不断流变迭代的“流动空间”。

第一类是那些对整座城市具有高度象征性、意义稳定的文学空间。“小说中真实的地理空间描写，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往往以城市地标为主要对象，围绕着能够代表城市特征的地标性建筑展开故事情节”，这样，城市的地标作为故事场景经常出现，“并逐步演变沉淀为一种城市意象”。<sup>③</sup>这些“城市意象”如同城市的“图腾”，其物理形态（能指）与一系列复杂的历史记忆、文化价值和集体情感（所指）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符号系统。它们往往是城市的地理或文化核心，经历了漫长时间的文学书写与民间传说的反复“凝定”，其意义已经超越了物理功能本身，升华为一种精神性的存在，成为城市叙事系统的“记忆索引”，其象征意义是如此稳固，以至于任何试图讲述城市故事的文本都几乎无法绕开它们。

在唐代传奇与笔记中，“勤政楼”正是这类文学空间的典型。作为帝国都城长安的娱乐中心，勤政楼在文学书写中承载了盛世的张扬与热烈，其场景中“百戏竞作，人物填咽”，<sup>④</sup>“观者数千万，众喧哗聚语”<sup>⑤</sup>的恢宏画面在《开天传信记》《乐府杂录》等文本中被反复渲染，不仅反映了帝都的盛世实况，更将这一空间提升为盛唐气象的视觉象征。然而，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得勤政楼的意象发生了深刻转折：从宴乐喧嚣、歌舞升平之所，到瞬间风流云散、繁华落尽，逐渐蜕变为长安民众追怀盛世、感慨今昔的情感符号。在《明皇杂录》《本事诗》的记述中，玄宗自蜀地重返长安，寻访旧日梨园子弟于勤政楼前，虽风景不殊，盛世气象已然失落，令人无限唏嘘。在这些长安叙事中，勤政楼始终与“开元盛世”的文化记忆紧密关联，成为今昔对比的叙事焦点。

除了浓缩城市历史的象征性空间，典型性的城市意象也在城市空间与市民情感生活的频繁互动中逐渐生成。以苏州虎丘为例，虎丘自古就是青衿仕女徘徊流连的去处。在清代小说《生花梦》中，初到苏州的康梦庚慕名往游虎丘，“见山涛七里，画楼雀舫，箫管蔽天，游女如云，万花若绮”；<sup>⑥</sup>在《孤山再梦》中，钱雨林与友人同往虎丘游赏，一路踏青走来，“只见桃花乱飞，人踏千片红玉；柳絮横舞，鸟啄万缕黄金”。<sup>⑦</sup>这些以苏州为背景的小说不约而同地选择虎丘作为核心叙事场景，不仅赋予情节以地理真实感，更使其成为凝结苏州城市文化特质的符号载体。黄周星所著《虎丘恋》叙述明代正德年间才子张灵与佳人崔莹在虎丘一见钟情，却因命运拨弄而双双殉情的悲剧。在这篇以虎丘为故事发生地的爱情小说中，其叙事细节中无不流露着姑苏城所凝结传承的浪漫情思与文采风流。正是在千年风流胜地虎丘的见证下，这样惊心动魄的才美奇情才具备了文化情感上的感染力，也唯有通过虎丘，苏州这座城市的风月文化与精神气质才得以如此完整、深刻地抒写与表达。

而当城市形态发展走向近现代，城市意象的空间生产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改变。对于漫步在十里洋场的城市叙事者而言，他们所观察、体验的城市空间充斥着嘈杂的信息，造型夸张、色彩鲜艳的广告牌与浓妆艳抹、盛装性感的摩登女郎时时冲击着他们的视觉神经，原本静态的空间因为现代交通的发展而成为一种流动的存在，“他们像漫游者一样步行上海街头、穿越异国情调十足的都市风景，寻找新的感觉（惊讶、过度刺激）、新的空间（经验方面的与文本方面的）、新的风格（写作上的与生活上的）”。<sup>⑧</sup>在这样瞬息万变的都会生活中，通过长期记忆沉淀、文化互动来建构城市意象的叙事已非主流，取而代之的是那些更能展示现代生活节奏和娱乐社交功能的都市“舞台场景”设置。以新感觉派作家笔下的“舞场”空间为例：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上海舞场业发展至顶峰，海上男女昼夜不息地混迹于声光交错、灯红酒绿的舞场，上海等级最高、



规模最大的百乐门、大都会、仙乐斯、丽都四大舞场<sup>④</sup>频繁出现在小说叙事中，成为都市人追求刺激享乐的纵欲欢场或缓解疲惫麻木的情绪码头。这些舞厅空间不再是作为历史记忆的载体或吟风咏月的文化空间，其存在的唯一价值就是为参与者提供一种都市性的身份凭证，如穆时英笔下的黑牡丹自述：“我是在奢侈里生活着的，脱离了爵士乐，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我便成了没有灵魂的人。”<sup>⑤</sup>在五光十色、轻歌曼舞的舞场上，人仿佛被溶解在这股由音乐和费洛蒙混合而成的热浪中，如刘呐鸥在《游戏》中所写：“中央一片光滑的地板反映着四周的椅桌和人们的错杂的光景，使人觉得，好像入了魔宫一样，心神都在一种魔力的势力下。”<sup>⑥</sup>舞厅被描述为一个令人失控、超越日常体验的城市魔幻空间，成为“魔都”的表征。

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被按下“加速键”，在全球化、消费主义和信息技术的冲击下，城市空间经历着剧烈的解构与重塑。原本被赋予空间的一切坚固的、神圣的、稳定的意义都开始烟消云散，代之而起的是第二类空间——流动的、功能的、短暂的、意义不断生灭的“非地方”。<sup>⑦</sup>本雅明对19世纪巴黎“拱廊街”的分析早已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趋势。拱廊街作为巴黎这个“举世公认为最豪华最时髦的大都市”<sup>⑧</sup>机体中的一个新型城市空间，其内部陈列的商品、流动的“闲逛者”、玻璃与钢铁的透明结构，都预示着一一种新的都市体验：空间不再是历史与记忆的载体，而是商品拜物教的展示橱窗和陌生人短暂相遇的舞台。<sup>⑨</sup>这种“流动空间”在20世纪以来的城市叙事中变得愈发普遍。火车站、地铁、百货公司、咖啡馆、电影院、立交桥……这些空间的首要特征是其“功能性”与“中转性”。人们来到这里，是为了消费、移动或短暂地停留，而非为了寻找历史的根基或文化的认同。在这些空间里，人际关系是匿名的、疏离的、工具性的，而空间本身的意义也被其即时的“使用价值”所取代，成为社会关系的“情境”而非“载体”。

城市叙事的无限性，正在于这种从“凝定空间”到“流动空间”的动态演变与情境并置。一方面，那些承载着厚重历史记忆的凝定空间为城市叙事提供着稳定性和话语深度；另一方面，那些不断生灭、功能迭代的流动空间，则如同城市的“流行词汇”，为城市叙事注入了活力、变化与无限的可能性。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众声喧哗”的场域，在这里，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集体记忆与个人体验、永恒的象征与短暂的流行相互碰撞对话。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叙事永远不会有终结的一天，因为只要城市本身还在生长、变化，新的空间、新的体验、新的故事就会源源不断地被创造出来。这种由空间符号的无限衍变所驱动的叙事生成机制，正是城市文化生命力的终极体现。

### 结语：在空间诗学重构中探寻城市文化精神

通过“四景重构”这一基于文学地理学的分析框架，本文对中国城市叙事的复杂面貌进行了一次由宏观到微观、由整体到局部的系统性扫描。“远景”研究在于证明中国城市叙事在广袤的疆域上形成了多个特色鲜明、相互关联的文学生态板块，其分布与演替深刻地反映了国家政治、经济与文化重心的历史变迁。“中景”研究则通过“双城记”的比较范式，揭示了城市之间在依存、竞争与对话中所产生的强大叙事张力，这种张力往往成为时代转型与文化冲突最敏锐的表征。“近景”研究深入城市内部，通过追溯其叙事文体的演进，阐释了一座城市的独特性是如何在物质、人文、记忆三重空间的交织中被历史性地书写与建构。“特写”研究则将分析的精度提升至极致，通过对具体空间符号的解码，分析那些承载着集体记忆的“凝定空间”如何为城市提供文化认同的基石，更洞察在城市化的加速进程中，那些“流动空间”如何以其不断生灭、功能迭代的特性，

为城市叙事带来了“众声喧哗”的无限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远景—中景—近景—特写”四种视角所构成的层级似乎只是由宏而微的视距变化，要想完成文学地理学逻辑的自然延伸，从外在表现抵达城市叙事的本质，则应将研究路径的选择转化为方法论层面的省察。我们认为，在“四景切换”之中，更应贯注系统论的思维，立足视角切换，强化学术理路与研究层次上的递进深入，通过传统转化、生态还原、空间融通、精神探源“四论”的拓展贯通，将城市叙事分析、整合、升华为系统性、结构性的空间诗学重构。具体而言，应加强以下四个层面的理论推进。

首先是“传统转化论”。当代城市叙事研究的深化，亟须从绵延深厚的传统城市叙事中汲取主旨观念、题材内容与文化底蕴的滋养。家国情怀构成了中国城市叙事的思想根基与精神深度。城市叙事始终与民族命运、社会变迁紧密相连，其超越个体悲欢、关切群体福祉与文明赓续的宏大情怀，是叙事超越物质记录、触及民族集体无意识与文化认同核心的动力源泉，赋予文本以历史厚重感与伦理庄严感。地域文化则展示了城市叙事的历史厚度与独特品格。中国广袤的地理与多样的人文环境，塑造了千姿百态的地域文化形态。这些根植于特定水土的文化个性，为城市叙事注入了鲜活的生命质感与可辨识的美学标签，使其得以在全球化和城市化浪潮中避免同质化，获得坚实的民族品格与地方性知识支撑。价值冲突为城市叙事提供了永恒的戏剧张力与叙事形式。作为各种社会力量、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交汇点，城市天然成为价值冲突上演的舞台。这种冲突在叙事中呈现出多元维度，构成了推动情节、塑造人物、揭示社会深层矛盾的叙事引擎，使城市叙事始终保持敏锐的现实关怀与强大的阐释活力。此三者——家国情怀的深度、地域文化的厚度、价值冲突的张力——共同构成了中国城市叙事传统的精神内核，为当代研究的“精神探源”提供了丰厚的文化资源和清晰的价值坐标。

其次是“生态还原论”。无论是远景、中景、近景还是特写，都必须将城市叙事视作一个有机的、动态的生态系统。这个系统以城市叙事文本为中心，勾连并激活了创作主体、作品本体、接受主体等诸多生态要素，形成一个彼此关联、共振互动的意义网络。<sup>⑥</sup>远景层面，对宏观文学版图的勾勒，须考虑不同文学生态区间的能量流动，揭示叙事资源分布与文学“势能”转移的动态过程。中景层面，对“双城”现象的剖析，须制定更加合理的对比和互文标准，以理解时代精神、经济模式、文化风尚在特定空间关系中的集中体现。近景层面，对单一城市文学叙事的追溯，必然涉及不同文体间的承续变异、官方与民间叙事的互动、本地与外来视角的融合，最后形成的不仅是特定城市的文学生态史，也是精神文化的演进史。在特写层面，城市叙事研究抵达最生动的微观现场，其存在证明城市的空间意义不仅来源于时代的宏大性，更源于个体心灵在城市叙事中被保存、讲述与重塑的记忆，正是这些持续不断的场景讲述，让城市精神得以在最细部的空间单元中生成、滋长、流动，并始终保持着向未来开放的生命力。

再次是“空间融通论”。城市叙事生态系统的核心运作机制，集中体现于其对城市空间的文学建构过程，这一过程典型地呈现为物质空间、人文空间与记忆空间的三重叠加与辩证统一。<sup>⑦</sup>这一探讨不仅适用于前文对城市小说的叙事形态的分析，还体现出对几乎一切城市文学书写的适用性。在“空间融通论”中，物质空间是叙事的第一重基础，指涉作为实体的建筑与地理环境，为叙事提供基础的地理坐标与空间框架。人文空间是第二重展开，孕育于物质空间又超越其物理属性，指向由人类活动赋予的社会、文化与情感内涵，使空间充满人的气息、社会的节奏与文化的属性。记忆空间是第三重升华，是叙事主体对前两重空间进行选择、加工与情感投射后重构的主观空间，将空间内化为影响命运、塑造性格、承载价值的核心要素。此三重空间并非截然分离：物质空间的独特



性与人文空间的标志性，需要通过持续的主观叙事才能被确认、强化并传承，形成稳定的城市意象。反之，记忆空间所承载的主观情感与文化想象，又须依附于具体可感的客观空间，方能获得坚实的体验基础与共鸣效应。三者交织互动，共同构成了城市叙事立体、生动且意蕴丰赡的结构层次。

最后是“精神探源论”，至少包含三个层次。其一，精神探源是对审美意识的提取与培育。城市美学超越了对城市物理形态与实用功能的客观描述，是叙事主体通过情感投射、文化想象与价值赋予所营造的主观地理感受。在此意识的引导下，城市的精神基质呈现为一种区域性的、可被感知的文化性格与美学氛围。其二，精神探源是对城市文化精神的论证、探索和反思，尤其是对原型空间的追溯，指向城市精神结构中那些相对稳定、深层且具有集体无意识色彩的内核，它往往与特定地域的“家园意识”，历史传承中的集体记忆以及反复出现的文化母题紧密相连。通过对叙事文体衍进与地方性知识的深度考古，可以揭示城市的精神谱系如何在历史书写中升华为文化根脉的归属体验与认同感。其三，精神探源的深化最终指向哲理思辨，指向一个具有无限可能性的“终极空间”。这是对城市精神永恒生成状态的隐喻，它意味着城市精神是一个在传统与现代、集体与个体、稳定与流变、记忆与遗忘的持续对话与协商中，不断超越自身、面向未来开放的生发过程。它是城市精神生命力最高体现的代表，在其动态平衡中蕴含着永恒发展的无限潜能。<sup>③</sup>

经由上述的路径探索与范式重构，一种城市空间诗学已然成形，也即以“四景切换”为特色路径，将城市叙事中人城共存模式与情感距离转化为学理性、多方位的考察视角，在纵向上把握城市叙事的文本形态演变与城市文化的内涵递进，在横向上囊括从世界视野、国家视野到城市全貌、城市特殊场景的不同空间叙事策略。它既考虑从城市客体空间到主体空间，再到文本空间的形态转化，也关注不同文学生态区间的文化关联和能量流动，最后指向意蕴丰厚的城市精神空间的营构。

回望城市叙事波澜壮阔的历史，人对于城市总有深情的凝望与亲切的晤谈时刻，绚丽的城市光影投射在历史的长廊中，深沉的文化图景不断被呈现、重构、传承。就这样，对于城市叙事研究的考察宛如一次次接踵而至的追随，我们追随着观察者的脚步，清晰感受着城市的生动脉搏，在城市的宏阔广场聆听历史的回响，叩问城市的心灵，由此品察和感悟天人相合、传承不息的城市文化精神，并见证这一空间诗学的潜心孕育和不断成长。

#### 注释：

- ① 本文采用“城市叙事”而非“城市文学”概念，主要基于以下考量：在现有研究中，“城市文学”的界定常陷入“泛城市文学”（泛指一切涉及城市内容的作品）与“现代性的城市文学”（特指工业化以降具有现代都市意识的文学）的概念争议之中。前者对城市文学定义较为宽泛，凡表现城市生活之各类作品均可称之为城市文学，后者则突出城市文学表达的现代性特征，指出城市文学的价值应当在于以现代意识去观照正在蜕变中的城市生活和都市人心态。为减少争议，有效涵盖从古代城市书写至现当代城市小说的演变历程，本文选用“城市叙事”这一更为中性的概念，聚焦城市叙事行为如何产生、组织并赋予城市空间以文化价值和时代意义，进而强化从文学叙事的“空间实践”视角探析城市文化精神的核心主旨。
- ② 陈晓明：《末路寻踪：在都市与历史之间》，《花城》1991年第5期。

③ 张惠范：《囚禁在现代性下的城市文学——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文学研究的反思》，《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④ 葛红兵：《构建都市精神与发展城市文学》，《文艺报》2001年8月14日002版。

⑤ 梅新林、葛永海：《文学地理学原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306—349页。

⑥ 此处的“文学地图”主要指与城市叙事关系最为密切的文本书写地理研究，参见梅新林、葛永海：《文学地理学原理》，第953—964页。

⑦ 荒江钓叟：《月球殖民地小说》，《绣像小说》1904年第27期。

⑧ 王韬：《淞隐漫录》，王思宇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351页。

⑨ 王韬：《漫游随录》，陈尚凡、任光亮校点，《走向世界丛书》，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98页。

- ⑩ 陆士谔：《商界现形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页。
- ⑪ 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宋世嘉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51页。
- ⑫ 吴福辉编选：《京派小说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前言页。
- ⑬ 晏杰雄、朱宣阳：《人物话语间性与城市地图显影——论新时代长篇小说的城市叙事》，《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3期。
- ⑭ 李云雷：《“新时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分期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10期。
- ⑮ 葛永海：《中国城市叙事的古典传统及其现代变革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第131页。
- ⑯ 孙逊、葛永海：《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双城”意象及其文化内涵》，《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 ⑰ 丁锡根点校：《宋元平话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44页。
- ⑱⑳ 洪楸：《清平山堂话本》，长沙：岳麓书社，2013年，第141页，第16页。
- ㉑㉒ 孟元老、周密等：《东京梦华录（外四种）》，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352页，第354页。
- ㉓ 葛永海：《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00页。
- ㉔ 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36页。
- ㉕ 葛永海：《扬州—上海：晚清小说中都市繁华梦的变迁》，《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 ㉖ 林棹：《潮汐图》，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第18—19页。
- ㉗ 王田田：《粤港澳大湾区集体记忆的内涵构建与演进逻辑》，《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5年第28期。
- ㉘ 梁启超认为“最古之史，实为方志”，孟子所称“晋《乘》、楚《檮杌》、鲁《春秋》”等，不过是一国之下的“地方”，“比附今著，则一府州县志而已”（见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12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567页）。傅振伦认为“《越绝书》先记山川、城郭、冢墓，次及记传，独传于今，后世方志，实仿于此”（见傅振伦：《中国方志学通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21页）。
- ㉙ 杨天宇译注：《周礼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655页。
- ㉚ 《中国地方志学概论》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城市方志学概论》，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第52页。
- ㉛ 萧纲等：《昭明文选》，武汉：崇文书局，2018年，第121页。
- ㉜ 瞿蜕园：《汉魏六朝赋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53页。
- ㉝ 刘忠：《现当代小说中的都市话语及其现代性走向》，《文学评论》2017年第5期。
- ㉞ 海上漱石生：《海上繁华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39页。
- ㉟ 张资平：《上帝的儿女们》，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93页。
- ㊱ 唐诗人：《探究当代城市文学本土化研究路径》，《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3年第3期。
- ㊲ 唐诗人、任涛然：《城市生命体的历史与想象——论邱华栋〈北京传〉》，《东吴学术》2022年第6期。
- ㊳ 段义孚：《经验透视中的空间和地方》，潘桂成译，台北：台北“国立”编译馆，1998年，第148页。
- ㊴ 孙逊、刘方：《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城市书写及现代阐释》，《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 ㊵ 郑祭：《开天传信记》，《教坊记（外三种）》，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84页。
- ㊶ 段安节：《乐府杂录》，《古今说海》，成都：巴蜀书社，1988年，第707页。
- ㊷ 古吴娥川主人：《生花梦》，《中国古代孤本小说》第一集，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28页。
- ㊸ 渭滨笠夫：《孤山再梦》，褚家伟校点，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9页。
- ㊹ 张英进：《理论、历史、都市：中西比较文学的跨学科视野》，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27页。
- ㊺ 张伟：《沪读旧影》，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第47页。
- ㊻ 穆时英：《穆时英小说全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284页。
- ㊼ 刘呐鸥：《都市风景线》，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第1页。
- ㊽ 参见马克·奥热：《非地点：超现代性人类学导论》，牟思浩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3年，序言。
- ㊾ 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188页。
- ㊿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陶德麟主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48—250页。
- ① 荀利波：《文学生态学研究——基于学术史梳理的讨论》，《文艺评论》2017年第12期。
- ② 曾礼军：《城市叙事：关乎时间、空间和人性》，《文汇报》2022年7月24日第7版。
- ③ 参见葛永海：《理论、路径与价值：论文学地理研究应有的三重自觉》，《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编辑 屠毅力